



平凡父亲的非凡理念

□杨自度

敬爱的父亲已去世整整40年了，但他高大、儒雅的身影和慈爱的笑容却常常浮现在我们儿女的眼前，他时常念叨并一生践行的一句话——“不管穷富，子孙最好的出路就是上学、求知、成才；国家要富强，就必须率先发展教育、科技”，不时在我们耳旁回响。靠他的这一非凡理念，我们杨家这个如东县乡下小镇上的寻常百姓家，他的子孙中已经出了17个具有高级专业职称的人才，同时，还带动了一方重视读书求学风气的蔚然形成。

我的父亲杨业祥于晚清末年——1909年出生于如东县银杏埭子乡下的一户农家，童年上了几年私塾，读遍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通文墨、会珠算，深受其经营染坊的祖父喜爱与信任。在我父17岁时，曾祖父就把银杏埭子上的染坊传予他经营。他天生喜爱读书，在忙于生意之余，还陆续买来四大名著等各类好书，常常挑灯夜读。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大旗，影响他逐渐形成了“国家要富强，教育、科技必须强”“子孙要有出息，必须读书、求知”的理念。在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我们门、占领如东多地，面临亡国之时，更加坚定了他的上述理念，并以其引领子女成长。

上世纪40年代，父亲就把年少的长兄杨自强送进新四军主办的学校读完高小。解放之初，大办学校，教师奇缺，紧急招聘，当时才20岁的长兄因成绩优秀，被选为小学老师。父亲叮嘱他：“当了老师，更要加紧拜师求教。”正巧，他任教的学校有一位大学生同事，于是便恭敬地拜其为师。他掌握了代数、几何、历史、地理等中学教材知识。4年后，如愿考上苏北师范。毕业前夕，父亲根据前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诲，毅然筹措100元，让长兄到上海和苏杭去“见识见识”。须知，上世纪50年代初的100元相当于干部几个月工资，乃是一笔巨资，况且当时完成个体工商业合作化，染坊被关，父亲成了合作商店的员工，工资较低。亲戚、邻居对此举摇头，而父亲不为所动。长兄毕业后，先后在如东县几所完中任教，最终成为如东县中学一位著书立说的高级教师，广受学生和长辈尊敬。后来，他的儿子、儿媳也在如东县中学任教，晋升到高级教师。

我的大姐杨淑君在解放之初已是20岁左右的大姑娘，在夜校学习了数年。父亲本着男女平等思想，决定送她到南通市一中读书。每月供给10万元(当时货币)，花这么多钱培养女儿，这让许多亲戚朋友很不理解。但是，父亲不管手头多紧，从不欠供。大姐初中毕业后，考进南通师范。1958年，28岁的她于通师毕业，先后在如东县几所小学任教，也成为高级教师。

我的二哥杨自坚于1961年在如东县中学毕业，各科成绩排名前列，但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不少高校撤销，存量高校也大幅缩减招生数量，加上招生上贯彻“阶级路线”，排斥

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因而家庭成分为“小业主”的二哥无奈落榜，回家务农。他当生产队会计、队长十多年，始终不丢书本、不忘求学，1977年，抓住机会当了代课教师，数年后转证，成为中学物理教师。他还指导儿子考上同济大学函授班，毕业后成为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

我于1963年在如东县中学初中毕业，因我成绩优异，老师帮我报考了省立江苏省南通中学。当时父亲工资减到26元，家里弟妹又多，全家温饱都成问题。接到录取通知书，得知我是如东县唯一考上通中的，全家和亲朋好友又喜又忧。而父亲却乐呵呵地拍板：“准备衣被，提前报到。”二哥用自行车把我送到100多华里外的学校报到缴费。成了等于进了大学门的“通中人”后，在享受每月5元助学金的同时，父亲每月寄来10元左右和不少粮票，让我竟比一些城里同学都宽裕。我也不负厚望，努力攻读，各科成绩都冒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胸有成竹、充满期待地迎接高考、填写志愿的1966年6月，“文革”爆发，停课、暂时取消大学招生，参加“斗批改”，被迫待在学校。等待恢复高考两年多，最后却等到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希望落空，回乡务农，父亲虽然心里失望，但仍鼓励我“天生我材必有用，总有机会在前面”。我也坚信，大学还是要办的，人才总是国家必需的。在参加生产队秋收、上河工之余，我坚持看书学习、练笔写作。不久应公社之招，做了几个月代课教师，后又当上半脱产的公社“土记者”。由于我写的报道、评论在《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省县广播电台频频出现，甚至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不久就被县革会通讯报道组借调。在此期间，又采写了许多重要报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1年参与策划、采写的一组报道《南公社党员群众学习党史的小故事》，在《人民日报》、省县广播电台频频出现，甚至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发文要求全省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组小故事，南通地区革委会则专门开大会表彰。1971年10月，县政工组突然通知我到南通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组织组报到，惊喜地得知，经南通地区军管会特批，我被正式调到地区报道组工作，一下子从农村户口、知青身份变为城市户口、机关干部身份。当时真有点怀疑这是不是南柯一梦。

被超常规重用，自然劲头十足，几年里陆续在新华社、《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消息、通讯、言论等数百篇，多次在《人民日报》发表整版或大半版的长篇通讯。1980年，针对关于农村改革是前进还是倒退的争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思想评论，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判断前进还是倒退，唯一的标准就是看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这个20来岁的小知青竟然在全省新闻界颇有

名声。那时，父亲在商店上班时，一有空就翻看《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一找到我写的文章就反复阅读，心里充满了自豪。1977年高考终于恢复，我立即打报告要求报考，但组织上以工作需要为由未予批准。1983年3月，地市合并，本人被安排到南通市委宣传部分管宣传科干事。1984年，党中央提出干部“四化”要求，选拔年轻干部上大学，进行正规化培训。组织上终于推荐我参加全省干部高考，由于我在通中的知识功底较为全面深厚，故以全省第一的总分考进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党政干部正规化教育专修班(委托南通师专)。总算圆了“大学梦”！通过两年“充电”，回到市委宣传部分管宣传科干事。1987年11月，为落实中央关于对在职干部进行正规化理论教育的决策部署，我被市委选拔到南通市委讲师团(一级局建制)任副团长，成功地组织了在全市3万多名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职干部的正规化理论教育，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同时，结合本职工作自觉从事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在省以上出版社出版主撰主编或参与的专著、编著有10多部，在省市以上理论刊物和报刊上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有多篇被收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等文集，获省高评委评定的副教授职称。

1995年6月，市委调我到南通日报社任副总编，分管采编工作。10多年中，我在做好报社新闻业务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每年都要亲自采写重点报道和言论上百篇，作品先后获省一等奖及以上奖项10多件，获省二等奖以上奖项30多件，发挥了新闻业务带头人的作用。2004年退居二线后，我整理、选编了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和言论作品集，近3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一书，被收入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的丛书——《当代人求真文丛》，由国家级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近30万字的新闻评论集《号角声声》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我的专业水平和学识水平得到学术界肯定，2007年被省高评委评定为教授级高级编辑职称。

在家教的影响下，我儿子杨晴川在通中获得全市唯一的“省级三好学生”荣誉，放弃保送北大中文系的资格，以市区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先后驻泰国、美国9年，40岁刚过就评上高级记者职称。我小弟杨自力在十年动乱时期上的中学，当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在家教、家风的影响下，仍勤奋读书，成绩出色。高中毕业后，高校仍关着门，他十六七岁就在生产队当队长。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立即鼓励他报考。他单独住到一间堆草的房子里，在煤油灯下加紧复习，一举考上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他几乎靠助学

金生活，吃苦耐劳，事事走在人前，成绩突出，品德优秀，被评为南京市优秀团员。1982年毕业，学校让他留校在党委宣传部工作。但他钟情于所学专业，两年后请调到南通市卫生防疫站。晋升到主任医师(教授级)职称，先后被提拔为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党委书记。

我的小妹杨秀琴更具有特殊的成长历程。由于她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就近上的学，高中毕业时基础不实，两次参加高考均因差几分而失利，本想弃学打工。当时父亲早已退休，老母亲也已无力下田干活，身边仅有小妹。但老父亲认为，“有好路不走，将来必后悔”，鼓励她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兄长等也支持她到水平较高的马塘中学读补习班。通过刻苦补习，学业大长，在1984年的高考中，考上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值得一提的是，她是在医院服侍身患绝症的老父亲期间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时病床上的父亲笑了，病房里的病友、医生护士都向我父亲投去羡慕、尊敬的目光，发出一声声惊叹。一个星期后，父亲似乎了却了最后的心愿，不幸去世。

小妹在大学期间努力学习，并为减轻家里的负担而到校外做家教。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南通市第二中学、廊坊市第二中学、郑州中学、东莞市商业学校任教。她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发愤图强，不仅成为高级教师，而且被评为广东省十佳教师。在她的严格的要求下，她女儿考上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现已获得博士学位，将赴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项目。

我二姐虽然未有机会读到中学，但在父亲的教诲和家风的影响下，严格要求子女读书上进，她女儿、儿子都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年，分别考上南通医学院、江苏理工大学，后来女儿朱爱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儿子朱卫平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父亲能恪守践行其理念，既得益于国家助学金的帮助，也靠我母亲的全力支持。我的母亲成珍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特别聪慧，能讲许多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又有超凡的心算口算能力，既是家里缝补浆洗之巧妇，又是田头收种种种的能手。她剪裁缝制各种衣服鞋袜的手艺速度惊人，烹调水平堪比大厨。七八个子女都是她亲手带大，家境并不好，但个个吃得饱、穿得体面。为此，她天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深刻领会赞同父亲的教育子孙的理念，全力支持父亲的相关决策。疼爱子孙，莫过如此！

平凡的父亲去世时身无分文，他恪守践行一个伟大理念，以毕生心血和微薄之力，培养一个个子后成才，在我们子女心目中，他就是最伟大的父亲；在乡邻的口碑中，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楷模。

永远感恩、缅怀平凡而伟大的父母亲！

无独有偶，一个月后在我们初中同学聚会时，当年的团支部书记、后曾任陈桥乡副乡长的范汉斌同学深情回忆起一件和我母亲有关的事。那是1967年秋冬季节，汉斌家翻修房屋，用水泥泥到天生港购置煤屑砖。返回时船行至唐闸西洋桥，港闸河上的两道闸门已关闭，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开放放行。天色已晚，店铺多已打烊，而且那时购买食物还要凭粮票。正当他徘徊街头、一筹莫展时遇到了我，到我家后，母亲留他吃晚饭。汉斌说还有人在船上，母亲立即又煮了一锅饭，把几位素不相识的老乡接到家来吃饭，当晚还留汉斌在我家住了一宿。五十多年过去了，老同学还记得母亲的善举，我们的同窗情谊也因此而延续至今。

《战国策》上有言曰：“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对古已有之的美德，母亲常用自己的话说：“人家帮我，要记在心上；我帮人家，不要放在心上”，并时常提示我们要这样做。在送别母亲时，我试撰一联：“含辛茹苦勤劳一生九六高寿人，积德行善厚以待人优良家风传”。可以说，这是对母亲平凡一生的总结，也是我们要把老一辈留下的好家风代代相传的承诺。

岁月在流逝，周家宅也演绎着人类繁衍生存的古老法则。先是外婆走了，后来妈妈辞世，再后来，父亲也离我们而去，只有那张“柜”还静静地安卧在老家40多年前建造的，被我们称为新屋的那间旧房里。睹物思人，我常常想，祖辈和父辈勤劳俭朴，为了摆脱贫穷付出了许多的艰辛，但是他们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如今乡下人富裕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但他们却不在乎了。想到这些，我不由得鼻子酸酸的。今天，当我再次肃立在这张见证了我家几代人悲欢离合和蹉跎岁月的柜床前，它不仅外公最后的遗物，也是我回望来路，珍惜当下最弥足珍贵的传家宝。

追憶慈母

□陈康衡

母亲退休后，有一次谈及在二钢时的艰苦情形，我问她为什么要去呢？母亲回答道：“毛主席说了，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母亲虽不是党员，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种敬业精神，始终激励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顺境不骄，逆境不馁，淡泊名利，追求真善美。

母亲早常说毛主席的另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晚年又记住了星云大师倡导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她心地善良，厚以待人，乐于助人。有些事儿我已忘了，但还有人记在心里。去年10月，我和多年前相识的李怀印博士恢复了联系。怀印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前任教授，已是中外知名学者。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时，为写以张謇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来南通，我当时在地处唐闸的南通市二中任教，经友人介绍，我陪怀印参观大生一厂，到市图书馆查资料。后来他出国深造、发展，研究成果丰硕。这次他看了我的《忆慈母》一文后，给我来信：“时常回想年轻时在南通的一幕，……尤其是曾到府上匆匆叩访，品尝过令慈大人的饭菜，品行令人敬仰”。怀印过誉了，非常感谢他记着来过南通、到过我家的情景。

情感驿站

生死之间的界限

□关立蓉

外婆去世已经30多年，但对她的思念，如衰杨叶尽思难尽。我在昏昏朦胧中睁大了眼，那些攥存的记忆，便一桩桩一件件地细细回想，清晰、膨胀、枝繁叶茂。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我就读的幼儿园，她是来给送一双棉手套和两颗糖果。站在学校挂满冰凌的大门下，我收到手套时，我6岁，已然感到了震惊，外婆有一双曾被裹足的小脚，她如何迈动不灵活的脚步，走了这么远的路？我知道，回去，她还要割猪草、喂鸡、缝麻袋、去河边洗衣淘米……她就像一颗不停旋转的陀螺，没有歇息的一片刻。

那双手套，我至今保存着，藏青色的涤纶面料，绒布里子，棉花已板结，细密的针线依旧传递着亲情的无限爱意。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丢失过很多东西，但手套跟着我辗转颠簸，成了思念的象征。

前年春节，在外婆的墓地，冬天的风，卷起地上的衰草，盘旋在墓碑上空。我突然感到时光在上面流动，滚向遥远的天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在承受着这无边时光的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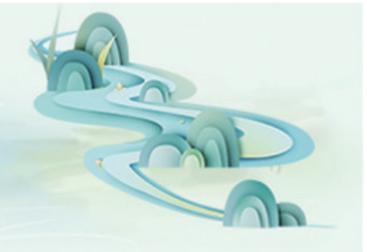
30多年过去，如今，她心疼的孙女已是眼角泛起细密的皱纹，青丝中夹杂杂着白发，她早已成了曾祖母。让外婆欣慰的是，她的曾外孙女学业优良，已经通过了保研面试，今年秋天，她就是沪上一所名校的研究生。在另一个看似静止的世界中，仍然有时光在流动，她仍然能分享着人间的欢愉，她仍然有一份做曾祖母的荣光。

老家有位朋友，去年春天，她的公公因癌症离世，今年春天，公公的父亲也撒手人寰。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文字，一下子让我泪目：在公公走了的这一年，他迅速地衰老，迅速地成为一个沉默的老人。他的听力慢慢变差，每次去婆婆家看望他，大声叫他爷爷，他会呆呆地看着你，算作应答。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和吃东西，以至于迅速地发胖。我们都以为他还能活几年。但是，今天，他永远地离开了。

短短一年多，失去两位亲人，该怎样安慰她悲伤的心？好在，前几天，又看见她发了一段文字，她的女儿从东京大学硕士毕业，在国内某互联网企业谋得职位。她说，今年的清明，有好消息告诉老人们，他们的孙女、曾孙女，他们一定还在牵挂着。以后，女儿结婚，生子……也一定不会忘记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会不断被改变，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时光流转，生命生生不息。

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一条什么样的界限，把两个世界分开，又把两个世界连在一起。躺在坟墓里的亲人，曾经就是温暖的灯、随行的影子。世间的门，孤独无助时，影子还能迸发出力量，宽慰亲人。

夜深，路灯昏黄，忽见拐角处一团红火。定睛一看，有人躲在墙角烧纸，火光隐晦，纸灰飘舞，如蝴蝶在空中随风曼舞。阵阵烟火夹杂着青草香，分明在提醒世间的人，清明，生死的沟通正在各个角落呢喃，无论多么遥远，他们都能准确地找到彼此。



外公最后的遗物

□陈汉忠

周家宅的老屋倒了，不经意间传来的消息，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忙不迭地询问：那张“柜”呢？“柜”还好，摆到新屋了。妹妹的回答让我松了一口气。

“柜”是海门方言中床的近义词，既能当床，又能贮物。在过去很漫长的岁月里，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这片土地上，木材紧俏昂贵，只有富贵人家才有可能拥有一张柜床。我家这张“柜”已有百余年历史，“柜”斑驳。我之所以把这张柜床看得如此珍贵，因为它是外公最后的遗物，承载着我和妈妈这一脉几代人的悲欢往事，见证了我童年的岁月，唤醒了遥远的记忆。

外公姓周，名云熊。在当时的周家宅，外公家也算殷实，除了宅后几亩良田，还有宅外朝南朝西五六间瓦房。据说到我外公时，家道开始败落。起因是外公不甘守着田地，想走出农门，闯一番新天地。外公先携家人到门头(今启东)做棉花生意，因为不景气又远涉荡里(今如东)雇人开垦滩涂，不想再次败走麦城。不得已就在长春镇弄个铺位卖小商品。但生意总是不太顺当，几年下来，不但家里的田荒废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生计，外公今天卖掉一个衣橱，明天搬出去几条桌椅，最后连宅上的房子也被卖掉顶债。久而久之，终于在贫病交加中，外公丢下外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撒手西去。

外公走了，孤苦伶仃的外婆强忍悲痛，踏着一双小脚，白天背一个牵一个，拉扯着两个女儿一块儿下地；晚上则在油灯下摇着纺车纺线，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残缺的家。没有了外公的老屋，几户人家徒四壁，好在还有一张柜床，给外婆留下了最后的慰藉。累了困了，还有一张“柜”靠一靠歇一歇。每每夜深人静，望着柜床上两个熟睡的女儿，外婆似乎看到了希望，拖着疲惫的身子，她为孩子掖好被子，再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裳，浆浆洗洗。此时此刻，外婆甚至有点感激外公，毕竟为她留下了这间避风避雨的房子和那张能让女儿熟睡的柜床。

从我记事起，这张“柜”似乎已经移交给了妈妈，也是我和弟弟妹妹嬉笑打闹的乐园。记不清有多少回，我们在上面蹦蹦跳跳，弄得柜板砰砰作响，在一旁纺线的外婆常常会停下活计，拉长声调喊道：“好了，好了，柜板要断了！”我们正玩在兴头上，外婆的喊话好像隔靴搔痒，几乎不起作用，唯有父亲看不过去，哼一声，或咳嗽一下，我们立刻乖了。

外公留下的“柜”，长不足两米，“柜”面上设三扇小窗，中门装有暗锁，既是家家的粮仓，也是被服箱，也是保险箱。东仓储粮，西仓存被，中仓则存放稍为贵重的物品，诸如田里收的芝麻，亲友馈赠的礼品，还有当时配给的食糖、红枣等紧俏货。妈妈还把年底卖猪攒的钱、交公粮的收据、供销社的布票、偶尔兑换到的粮票，以及油菜籽兑油的提货单等。每每需要取物，妈妈会掏出专用钥匙。妈妈把钥匙藏在哪里，似乎连父亲也不知道。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周家宅上来了一群陌生的壮年汉子，七手八脚把“柜”抬走了。这一夜，老屋里用凳子 and 旧木板重新搭起了一张床。我久久地难以入睡，后来，做了个梦，梦见了从未谋面的外公。外公黑着脸问外婆，“柜”呢？没有了“柜”，孩子们睡哪呢？我哭着扑向外公的怀抱，却突然醒了。原来天已大亮，外婆正搂着我的头，替我拭起眼角的泪水。大约半个月后，柜床又被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老屋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柜”虽然物归原主，但贫穷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仅我的家，还有宅上的乡亲们，年年口粮青黄不接，甚至等靠公社的救济粮度日。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偏远的小村庄，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亲们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接着乡镇企业如雨春笋冒了出来，农民也有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再后来，民营企业、家庭农场等应运而生。这期间，我妹妹进了公社的蚌珠场当工人，我参军入伍提了干。乡亲们的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花甲之年的父母亲似乎也尝到了小康生活的味道。我们家一盖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电器、家具一应俱全。父亲还请木匠师傅上门打造了一张雕刻着花鸟等各式图案的桃木架子床，外公留下的“柜”被冷落在了老宅的旧屋里。

岁月在流逝，周家宅也演绎着人类繁衍生存的古老法则。先是外婆走了，后来妈妈辞世，再后来，父亲也离我们而去，只有那张“柜”还静静地安卧在老家40多年前建造的，被我们称为新屋的那间旧房里。睹物思人，我常常想，祖辈和父辈勤劳俭朴，为了摆脱贫穷付出了许多的艰辛，但是他们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如今乡下人富裕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但他们却不在乎了。想到这些，我不由得鼻子酸酸的。今天，当我再次肃立在这张见证了我家几代人悲欢离合和蹉跎岁月的柜床前，它不仅外公最后的遗物，也是我回望来路，珍惜当下最弥足珍贵的传家宝。

追忆慈母

□陈康衡

母亲退休后，有一次谈及在二钢时的艰苦情形，我问她为什么要去呢？母亲回答道：“毛主席说了，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母亲虽不是党员，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种敬业精神，始终激励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顺境不骄，逆境不馁，淡泊名利，追求真善美。

母亲早常说毛主席的另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晚年又记住了星云大师倡导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她心地善良，厚以待人，乐于助人。有些事儿我已忘了，但还有人记在心里。去年10月，我和多年前相识的李怀印博士恢复了联系。怀印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前任教授，已是中外知名学者。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时，为写以张謇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来南通，我当时在地处唐闸的南通市二中任教，经友人介绍，我陪怀印参观大生一厂，到市图书馆查资料。后来他出国深造、发展，研究成果丰硕。这次他看了我的《忆慈母》一文后，给我来信：“时常回想年轻时在南通的一幕，……尤其是曾到府上匆匆叩访，品尝过令慈大人的饭菜，品行令人敬仰”。怀印过誉了，非常感谢他记着来过南通、到过我家的情景。

情感驿站

岁月物语

追憶慈母

□陈康衡

母亲退休后，有一次谈及在二钢时的艰苦情形，我问她为什么要去呢？母亲回答道：“毛主席说了，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母亲虽不是党员，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种敬业精神，始终激励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顺境不骄，逆境不馁，淡泊名利，追求真善美。

母亲早常说毛主席的另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晚年又记住了星云大师倡导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她心地善良，厚以待人，乐于助人。有些事儿我已忘了，但还有人记在心里。去年10月，我和多年前相识的李怀印博士恢复了联系。怀印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前任教授，已是中外知名学者。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时，为写以张謇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来南通，我当时在地处唐闸的南通市二中任教，经友人介绍，我陪怀印参观大生一厂，到市图书馆查资料。后来他出国深造、发展，研究成果丰硕。这次他看了我的《忆慈母》一文后，给我来信：“时常回想年轻时在南通的一幕，……尤其是曾到府上匆匆叩访，品尝过令慈大人的饭菜，品行令人敬仰”。怀印过誉了，非常感谢他记着来过南通、到过我家的情景。

情感驿站

生死之间的界限

□关立蓉

外婆去世已经30多年，但对她的思念，如衰杨叶尽思难尽。我在昏昏朦胧中睁大了眼，那些攥存的记忆，便一桩桩一件件地细细回想，清晰、膨胀、枝繁叶茂。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我就读的幼儿园，她是来给送一双棉手套和两颗糖果。站在学校挂满冰凌的大门下，我收到手套时，我6岁，已然感到了震惊，外婆有一双曾被裹足的小脚，她如何迈动不灵活的脚步，走了这么远的路？我知道，回去，她还要割猪草、喂鸡、缝麻袋、去河边洗衣淘米……她就像一颗不停旋转的陀螺，没有歇息的一片刻。

那双手套，我至今保存着，藏青色的涤纶面料，绒布里子，棉花已板结，细密的针线依旧传递着亲情的无限爱意。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丢失过很多东西，但手套跟着我辗转颠簸，成了思念的象征。

前年春节，在外婆的墓地，冬天的风，卷起地上的衰草，盘旋在墓碑上空。我突然感到时光在上面流动，滚向遥远的天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在承受着这无边时光的拍打。

30多年过去，如今，她心疼的孙女已是眼角泛起细密的皱纹，青丝中夹杂杂着白发，她早已成了曾祖母。让外婆欣慰的是，她的曾外孙女学业优良，已经通过了保研面试，今年秋天，她就是沪上一所名校的研究生。在另一个看似静止的世界中，仍然有时光在流动，她仍然能分享着人间的欢愉，她仍然有一份做曾祖母的荣光。

老家有位朋友，去年春天，她的公公因癌症离世，今年春天，公公的父亲也撒手人寰。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文字，一下子让我泪目：在公公走了的这一年，他迅速地衰老，迅速地成为一个沉默的老人。他的听力慢慢变差，每次去婆婆家看望他，大声叫他爷爷，他会呆呆地看着你，算作应答。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和吃东西，以至于迅速地发胖。我们都以为他还能活几年。但是，今天，他永远地离开了。

短短一年多，失去两位亲人，该怎样安慰她悲伤的心？好在，前几天，又看见她发了一段文字，她的女儿从东京大学硕士毕业，在国内某互联网企业谋得职位。她说，今年的清明，有好消息告诉老人们，他们的孙女、曾孙女，他们一定还在牵挂着。以后，女儿结婚，生子……也一定不会忘记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会不断被改变，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时光流转，生命生生不息。

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一条什么样的界限，把两个世界分开，又把两个世界连在一起。躺在坟墓里的亲人，曾经就是温暖的灯、随行的影子。世间的门，孤独无助时，影子还能迸发出力量，宽慰亲人。

夜深，路灯昏黄，忽见拐角处一团红火。定睛一看，有人躲在墙角烧纸，火光隐晦，纸灰飘舞，如蝴蝶在空中随风曼舞。阵阵烟火夹杂着青草香，分明在提醒世间的人，清明，生死的沟通正在各个角落呢喃，无论多么遥远，他们都能准确地找到彼此。

外公最后的遗物

□陈汉忠

周家宅的老屋倒了，不经意间传来的消息，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忙不迭地询问：那张“柜”呢？“柜”还好，摆到新屋了。妹妹的回答让我松了一口气。

“柜”是海门方言中床的近义词，既能当床，又能贮物。在过去很漫长的岁月里，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这片土地上，木材紧俏昂贵，只有富贵人家才有可能拥有一张柜床。我家这张“柜”已有百余年历史，“柜”斑驳。我之所以把这张柜床看得如此珍贵，因为它是外公最后的遗物，承载着我和妈妈这一脉几代人的悲欢往事，见证了我童年的岁月，唤醒了遥远的记忆。

外公姓周，名云熊。在当时的周家宅，外公家也算殷实，除了宅后几亩良田，还有宅外朝南朝西五六间瓦房。据说到我外公时，家道开始败落。起因是外公不甘守着田地，想走出农门，闯一番新天地。外公先携家人到门头(今启东)做棉花生意，因为不景气又远涉荡里(今如东)雇人开垦滩涂，不想再次败走麦城。不得已就在长春镇弄个铺位卖小商品。但生意总是不太顺当，几年下来，不但家里的田荒废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生计，外公今天卖掉一个衣橱，明天搬出去几条桌椅，最后连宅上的房子也被卖掉顶债。久而久之，终于在贫病交加中，外公丢下外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撒手西去。

外公走了，孤苦伶仃的外婆强忍悲痛，踏着一双小脚，白天背一个牵一个，拉扯着两个女儿一块儿下地；晚上则在油灯下摇着纺车纺线，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残缺的家。没有了外公的老屋，几户人家徒四壁，好在还有一张柜床，给外婆留下了最后的慰藉。累了困了，还有一张“柜”靠一靠歇一歇。每每夜深人静，望着柜床上两个熟睡的女儿，外婆似乎看到了希望，拖着疲惫的身子，她为孩子掖好被子，再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裳，浆浆洗洗。此时此刻，外婆甚至有点感激外公，毕竟为她留下了这间避风避雨的房子和那张能让女儿熟睡的柜床。

从我记事起，这张“柜”似乎已经移交给了妈妈，也是我和弟弟妹妹嬉笑打闹的乐园。记不清有多少回，我们在上面蹦蹦跳跳，弄得柜板砰砰作响，在一旁纺线的外婆常常会停下活计，拉长声调喊道：“好了，好了，柜板要断了！”我们正玩在兴头上，外婆的喊话好像隔靴搔痒，几乎不起作用，唯有父亲看不过去，哼一声，或咳嗽一下，我们立刻乖了。

外公留下的“柜”，长不足两米，“柜”面上设三扇小窗，中门装有暗锁，既是家家的粮仓，也是被服箱，也是保险箱。东仓储粮，西仓存被，中仓则存放稍为贵重的物品，诸如田里收的芝麻，亲友馈赠的礼品，还有当时配给的食糖、红枣等紧俏货。妈妈还把年底卖猪攒的钱、交公粮的收据、供销社的布票、偶尔兑换到的粮票，以及油菜籽兑油的提货单等。每每需要取物，妈妈会掏出专用钥匙。妈妈把钥匙藏在哪里，似乎连父亲也不知道。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周家宅上来了一群陌生的壮年汉子，七手八脚把“柜”抬走了。这一夜，老屋里用凳子和旧木板重新搭起了一张床。我久久地难以入睡，后来，做了个梦，梦见了从未谋面的外公。外公黑着脸问外婆，“柜”呢？没有了“柜”，孩子们睡哪呢？我哭着扑向外公的怀抱，却突然醒了。原来天已大亮，外婆正搂着我的头，替我拭起眼角的泪水。大约半个月后，柜床又被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老屋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柜”虽然物归原主，但贫穷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仅我的家，还有宅上的乡亲们，年年口粮青黄不接，甚至等靠公社的救济粮度日。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偏远的小村庄，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亲们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接着乡镇企业如雨春笋冒了出来，农民也有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再后来，民营企业、家庭农场等应运而生。这期间，我妹妹进了公社的蚌珠场当工人，我参军入伍提了干。乡亲们的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花甲之年的父母亲似乎也尝到了小康生活的味道。我们家一盖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电器、家具一应俱全。父亲还请木匠师傅上门打造了一张雕刻着花鸟等各式图案的桃木架子床，外公留下的“柜”被冷落在了老宅的旧屋里。

岁月在流逝，周家宅也演绎着人类繁衍生存的古老法则。先是外婆走了，后来妈妈辞世，再后来，父亲也离我们而去，只有那张“柜”还静静地安卧在老家40多年前建造的，被我们称为新屋的那间旧房里。睹物思人，我常常想，祖辈和父辈勤劳俭朴，为了摆脱贫穷付出了许多的艰辛，但是他们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如今乡下人富裕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但他们却不在乎了。想到这些，我不由得鼻子酸酸的。今天，当我再次肃立在这张见证了我家几代人悲欢离合和蹉跎岁月的柜床前，它不仅外公最后的遗物，也是我回望来路，珍惜当下最弥足珍贵的传家宝。

追忆慈母

□陈康衡

母亲退休后，有一次谈及在二钢时的艰苦情形，我问她为什么要去呢？母亲回答道：“毛主席说了，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母亲虽不是党员，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种敬业精神，始终激励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顺境不骄，逆境不馁，淡泊名利，追求真善美。

母亲早常说毛主席的另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晚年又记住了星云大师倡导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她心地善良，厚以待人，乐于助人。有些事儿我已忘了，但还有人记在心里。去年10月，我和多年前相识的李怀印博士恢复了联系。怀印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前任教授，已是中外知名学者。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时，为写以张謇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来南通，我当时在地处唐闸的南通市二中任教，经友人介绍，我陪怀印参观大生一厂，到市图书馆查资料。后来他出国深造、发展，研究成果丰硕。这次他看了我的《忆慈母》一文后，给我来信：“时常回想年轻时在南通的一幕，……尤其是曾到府上匆匆叩访，品尝过令慈大人的饭菜，品行令人敬仰”。怀印过誉了，非常感谢他记着来过南通、到过我家的情景。

情感驿站

生死之间的界限

□关立蓉

外婆去世已经30多年，但对她的思念，如衰杨叶尽思难尽。我在昏昏朦胧中睁大了眼，那些攥存的记忆，便一桩桩一件件地细细回想，清晰、膨胀、枝繁叶茂。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我就读的幼儿园，她是来给送一双棉手套和两颗糖果。站在学校挂满冰凌的大门下，我收到手套时，我6岁，已然感到了震惊，外婆有一双曾被裹足的小脚，她如何迈动不灵活的脚步，走了这么远的路？我知道，回去，她还要割猪草、喂鸡、缝麻袋、去河边洗衣淘米……她就像一颗不停旋转的陀螺，没有歇息的一片刻。

那双手套，我至今保存着，藏青色的涤纶面料，绒布里子，棉花已板结，细密的针线依旧传递着亲情的无限爱意。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丢失过很多东西，但手套跟着我辗转颠簸，成了思念的象征。

前年春节，在外婆的墓地，冬天的风，卷起地上的衰草，盘旋在墓碑上空。我突然感到时光在上面流动，滚向遥远的天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在承受着这无边时光的拍打。

30多年过去，如今，她心疼的孙女已是眼角泛起细密的皱纹，青丝中夹杂杂着白发，她早已成了曾祖母。让外婆欣慰的是，她的曾外孙女学业优良，已经通过了保研面试，今年秋天，她就是沪上一所名校的研究生。在另一个看似静止的世界中，仍然有时光在流动，她仍然能分享着人间的欢愉，她仍然有一份做曾祖母的荣光。

老家有位朋友，去年春天，她的公公因癌症离世，今年春天，公公的父亲也撒手人寰。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文字，一下子让我泪目：在公公走了的这一年，他迅速地衰老，迅速地成为一个沉默的老人。他的听力慢慢变差，每次去婆婆家看望他，大声叫他爷爷，他会呆呆地看着你，算作应答。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和吃东西，以至于迅速地发胖。我们都以为他还能活几年。但是，今天，他永远地离开了。

短短一年多，失去两位亲人，该怎样安慰她悲伤的心？好在，前几天，又看见她发了一段文字，她的女儿从东京大学硕士毕业，在国内某互联网企业谋得职位。她说，今年的清明，有好消息告诉老人们，他们的孙女、曾孙女，他们一定还在牵挂着。以后，女儿结婚，生子……也一定不会忘记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会不断被改变，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时光流转，生命生生不息。

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一条什么样的界限，把两个世界分开，又把两个世界连在一起。躺在坟墓里的亲人，曾经就是温暖的灯、随行的影子。世间的门，孤独无助时，影子还能迸发出力量，宽慰亲人。

夜深，路灯昏黄，忽见拐角处一团红火。定睛一看，有人躲在墙角烧纸，火光隐晦，纸灰飘舞，如蝴蝶在空中随风曼舞。阵阵烟火夹杂着青草香，分明在提醒世间的人，清明，生死的沟通正在各个角落呢喃，无论多么遥远，他们都能准确地找到彼此。

外公最后的遗物

□陈汉忠

周家宅的老屋倒了，不经意间传来的消息，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忙不迭地询问：那张“柜”呢？“柜”还好，摆到新屋了。妹妹的回答让我松了一口气。

“柜”是海门方言中床的近义词，既能当床，又能贮物。在过去很漫长的岁月里，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这片土地上，木材紧俏昂贵，只有富贵人家才有可能拥有一张柜床。我家这张“柜”已有百余年历史，“柜”斑驳。我之所以把这张柜床看得如此珍贵，因为它是外公最后的遗物，承载着我和妈妈这一脉几代人的悲欢往事，见证了我童年的岁月，唤醒了遥远的记忆。

外公姓周，名云熊。在当时的周家宅，外公家也算殷实，除了宅后几亩良田，还有宅外朝南朝西五六间瓦房。据说到我外公时，家道开始败落。起因是外公不甘守着田地，想走出农门，闯一番新天地。外公先携家人到门头(今启东)做棉花生意，因为不景气又远涉荡里(今如东)雇人开垦滩涂，不想再次败走麦城。不得已就在长春镇弄个铺位卖小商品。但生意总是不太顺当，几年下来，不但家里的田荒废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生计，外公今天卖掉一个衣橱，明天搬出去几条桌椅，最后连宅上的房子也被卖掉顶债。久而久之，终于在贫病交加中，外公丢下外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撒手西去。

外公走了，孤苦伶仃的外婆强忍悲痛，踏着一双小脚，白天背一个牵一个，拉扯着两个女儿一块儿下地；晚上则在油灯下摇着纺车纺线，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残缺的家。没有了外公的老屋，几户人家徒四壁，好在还有一张柜床，给外婆留下了最后的慰藉。累了困了，还有一张“柜”靠一靠歇一歇。每每夜深人静，望着柜床上两个熟睡的女儿，外婆似乎看到了希望，拖着疲惫的身子，她为孩子掖好被子，再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裳，浆浆洗洗。此时此刻，外婆甚至有点感激外公，毕竟为她留下了这间避风避雨的房子和那张能让女儿熟睡的柜床。

从我记事起，这张“柜”似乎已经移交给了妈妈，也是我和弟弟妹妹嬉笑打闹的乐园。记不清有多少回，我们在上面蹦蹦跳跳，弄得柜板砰砰作响，在一旁纺线的外婆常常会停下活计，拉长声调喊道：“好了，好了，柜板要断了！”我们正玩在兴头上，外婆的喊话好像隔靴搔痒，几乎不起作用，唯有父亲看不过去，哼一声，或咳嗽一下，我们立刻乖了。

外公留下的“柜”，长不足两米，“柜”面上设三扇小窗，中门装有暗锁，既是家家的粮仓，也是被服箱，也是保险箱。东仓储粮，西仓存被，中仓则存放稍为贵重的物品，诸如田里收的芝麻，亲友馈赠的礼品，还有当时配给的食糖、红枣等紧俏货。妈妈还把年底卖猪攒的钱、交公粮的收据、供销社的布票、偶尔兑换到的粮票，以及油菜籽兑油的提货单等。每每需要取物，妈妈会掏出专用钥匙。妈妈把钥匙藏在哪里，似乎连父亲也不知道。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周家宅上来了一群陌生的壮年汉子，七手八脚把“柜”抬走了。这一夜，老屋里用凳子和旧木板重新搭起了一张床。我久久地难以入睡，后来，做了个梦，梦见了从未谋面的外公。外公黑着脸问外婆，“柜”呢？没有了“柜”，孩子们睡哪呢？我哭着扑向外公的怀抱，却突然醒了。原来天已大亮，外婆正搂着我的头，替我拭起眼角的泪水。大约半个月后，柜床又被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老屋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柜”虽然物归原主，但贫穷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仅我的家，还有宅上的乡亲们，年年口粮青黄不接，甚至等靠公社的救济粮度日。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偏远的小村庄，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亲们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接着乡镇企业如雨春笋冒了出来，农民也有了外出打工的机会。再后来，民营企业、家庭农场等应运而生。这期间，我妹妹进了公社的蚌珠场当工人，我参军入伍提了干。乡亲们的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花甲之年的父母亲似乎也尝到了小康生活的味道。我们家一盖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电器、家具一应俱全。父亲还请木匠师傅上门打造了一张雕刻着花鸟等各式图案的桃木架子床，外公留下的“柜”被冷落在了老宅的旧屋里。

岁月在流逝，周家宅也演绎着人类繁衍生存的古老法则。先是外婆走了，后来妈妈辞世，再后来，父亲也离我们而去，只有那张“柜”还静静地安卧在老家40多年前建造的，被我们称为新屋的那间旧房里。睹物思人，我常常想，祖辈和父辈勤劳俭朴，为了摆脱贫穷付出了许多的艰辛，但是他们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如今乡下人富裕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但他们却不在乎了。想到这些，我不由得鼻子酸酸的。今天，当我再次肃立在这张见证了我家几代人悲欢离合和蹉跎岁月的柜床前，它不仅外公最后的遗物，也是我回望来路，珍惜当下最弥足珍贵的传家宝。

追忆慈母

□陈康衡

母亲退休后，有一次谈及在二钢时的艰苦情形，我问她为什么要去呢？母亲回答道：“毛主席说了，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母亲虽不是党员，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种敬业精神，始终激励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顺境不骄，逆境不馁，淡泊名利，追求真善美。

母亲早常说毛主席的另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晚年又记住了星云大师倡导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她心地善良，厚以待人，乐于助人。有些事儿我已忘了，但还有人记在心里。去年10月，我和多年前相识的李怀印博士恢复了联系。怀印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前任教授，已是中外知名学者。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时，为写以张謇为研究对象的毕业论文来南通，我当时在地处唐闸的南通市二中任教，经友人介绍，我陪怀印参观大生一厂，到市图书馆查资料。后来他出国深造、发展，研究成果丰硕。这次他看了我的《忆慈母》一文后，给我来信：“时常回想年轻时在南通的一幕，……尤其是曾到府上匆匆叩访，品尝过令慈大人的饭菜，品行令人敬仰”。怀印过誉了，非常感谢他记着来过南通、到过我家的情景。